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100-108.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10epctc>



特德·姜小说《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的后伦理选择探究

刘璇 (Liu Xuan), 曲涛 (Qu Tao)

摘要: 特德·姜的《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以技术时代伦理困境为切口, 通过棱镜技术对自由意志的解构, 揭示了后伦理选择时代的主体性危机与重构。本文聚焦后伦理选择的三种表征,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探讨技术与伦理的复杂博弈。单向度伦理者的覆灭警示技术资本化对主体性的吞噬; 一心向善者演绎了科技祛魅下主体存在的道德救赎; 道德觉醒者则找出了科学选择语境下重构主体性的核心路径。当科技解构传统道德因果链, 人类需在“真——善”价值导向下缔造向善节点, 将伦理自觉内化为技术反思的根基, 从而在平行世界的可能性之网中守护人性道德。

关键词: 特德·姜; 《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 后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刘璇,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小说, 电邮: LXuan1223@163.com。曲涛 (通讯作者),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小说、叙事学, 电邮: qutao@dlufl.edu.cn。

Title: An Exploration of Post-Ethical Choices in Ted Chiang's Novel *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

Abstract: Ted Chiang's *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 probes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the technological age by deconstructing free will through prism technology, revealing the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the post-ethical-choice er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post-ethical choices, exploring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thics through the lens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The demise of the one-dimensional ethicist serves as a warning about how techno-capitalism consumes subjectivity; the morally resolute

individual exemplifies the moral redemption of existential agency amid technological disenchantment; while the ethically awakened subject charts a core pathway for reconstructing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cientific choice. When technology deconstructs traditional moral causality, humanity must forge nodes of benevolence guided by the values of truth-goodness, internalizing ethical awareness as the cornerstone of technological reflexivity, thereby preserving human morality within the web of possibilities across parallel worlds.

Keywords: Ted Chiang; *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 post-ethical choice

Author Biographies: Liu Xuan, Master's candidate a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interests: 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 E-mail: LXuan1223@163.com. Qu Tao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interests: 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 narratology. E-mail: qutao@dlufl.edu.cn.

技术与伦理的博弈已经成为当代科幻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不仅越来越多的专职作家关注科技对人文世界的影响，作为技术工作者的特德·姜（Ted Chiang）也会在业余时间创作科幻小说，从一名软件工程师的视角来思考技术伦理。他的作品多为“软科幻”（Soft Science Fiction），融汇数学、物理学、天文学、语言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但并不执着于详细阐释科学原理，而是把精密技术作为故事的背景，以此来切入当下的人类世界，因而表现出“一种普遍关怀的人文思想”（徐刚、胡铁生，2023, p.93）。他擅长将人类文明困境转化为具象化的叙事实验，为审视后伦理选择时代的主体性危机提供了独特的认知坐标，也因此让他包揽美国所有科幻大奖。近年来，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已开始关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互动机制（徐晓雪，2025, pp.157-160），而特德·姜的小说则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探讨技术时代的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案例。

聂珍钊（2014, p.33）对人类文明也多有思考，他提出的人类文明发展三段论——自然选择、伦理选择与科学选择，为解读技术时代的人类困境提供了重要切口。自然选择阶段塑造了人的肉身形式，伦理选择阶段通过道德规范建构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而在科学选择阶段，技术与伦理的复杂角力则成为了核心命题。苏晖（2022, p.38）把从伦理选择向科学选择的过渡时期称之为“后伦理选择时代”，在这一时代，科技伦理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庞好农（2022, p.65）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幻作家警惕地关注着科学研究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特德·姜在《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中正预演了这种后果：当“棱镜”技术赋予人类与平行自我交流的能力时，科技与伦理的博弈被具象化为一场关于道德选择的眩晕。正如科幻研究者L·德尔·雷伊（Lester del Ray）所言，“‘科幻小说’就是试图描述‘种种替代世界的可能性’”，（吴岩，2008, p.18）而棱镜技术恰恰创造了这样一种替代世界的入口——每个持有者都能通过有限次数的对话，窥见那些“可能成为却未曾成为”的自我。在他构建的故事中，棱镜技术以其精巧的物理限制编织出复杂的人性样态，这种观测装置赋予每个持有者有限次数的跨时空对话权限——使用者可通过文字与影像与平行自我交换信息，而在数据簿耗尽之时，会永久失去与该时间线分支的联系。

这种刻意设计的通信方式构成了迷惑性的伦理困境：当人类能够了解做了其他选择的分支情况之时，道德责任也会被无数个平行自我分摊。正如厄尔森开枪前所说，“既然总有一个平行自我会开枪，那为什么不能是我？”（Chiang, 2020, p.266）¹平行自我的存在会让人将恶行推脱给必然选择，作恶的分支仿佛让当下的善行也失去了意义。奈特的疑问也是棱镜时代大部分人的疑惑：如果大部分的平行自我都在做恶，是否说明自己本性即为恶？既然如此，那单一分支的向善是否还有必要？除此之外，平行自我的成功也会让人产生“自己也行”的错觉，错把可能的平行分支当作必然的未来预言，而忘记蝴蝶一次翅膀的煽动都会造成结果的巨变。以上棱镜带来的种种困境不过是“一小片想象，但经由它，我们获得进入现实的入口”。（Wright & Edmond, 1999, p.122）这些问题在本质上体现了后伦理选择时代的核心命题：在科学选择已实质介入伦理判断的今天，作为选择主体的人类该如何守护道德的根基？本文将聚焦《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中三位伦理主体所面临的伦理选择，通过解构莫罗的资本理性覆灭、戴娜的科技救赎及奈特的存在觉醒，探寻在后伦理选择时代人类该如何处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而对后伦理困境的回应首先体现在技术资本化引发的伦理主体消亡——当棱镜技术成为商品流通的介质，资本逻辑对人性价值的侵蚀已不可避免。

一、镜像深渊：单向度伦理者的覆灭

莫罗的悲剧展现了科技与资本合谋时的人性异化。当技术突破伦理边界，人的道德判断将如何被系统性扭曲？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曾指出，科幻小说“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主要形势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Suvin, 1979, p.7）特德·姜正是通过棱镜技术这一陌生化手法，将日常伦理困境置入平行世界的想象框架，迫使读者在认知层面重新审视技术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伦理主体的隐秘侵蚀。作为资本主义技术精英的典型代表，莫罗的生存策略始终遵循两条铁律：将情感关系数据化，将伦理选择利益化。他不仅是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忠实践行者，更是科技宿命论的牺牲品，其命运轨迹构成了技术时代伦理选择困境的典型剖面。这种资本异化的操作本质，在莫罗处理棱镜交易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

莫罗对棱镜的熟练操控，本质上是对科技工具的极端物化。莫罗低价收购拥有“丧夫妻子时间线”的棱镜，再将其高价卖给本时间线上对应的丧妻明星丈夫，甚至坚持要在丧偶夫妻试过棱镜后再谈价格，只因为确信他们彼此见过面后无心讨价还价，容易卖高价。并且收购棱镜的手段也并不光彩，他先指使员工去诱骗棱镜持有者莱尔主动出售棱镜，后又反感流程太慢，打算雇佣水军在网上传黑莱尔，破坏其心理防线，让他永远都不想了解其他分支自己的幸福生活，从而将棱镜出售。莫罗“把悲痛的人看作牟利的机会”，（p.265）将伦理关怀拆解为资本数字中的变量。他为公司稳定创收的能力，本质上是用资本理性取代了伦理道德。其作为“我聊”店长的擢升轨迹，暗示着资本与技术结盟时代新型剥削关系的形成。在这个层面上，莫罗的行为看似主动掌控技术，实则沦为资本增殖法则的技术具身化存在，最终导致技术应用与人性价值的彻底割裂。当技术工具彻底臣服于资本增殖法则时，人性的伦理温度将被系统性剥离，厄尔森夫人的案例正映射了这种异化的终极形态。

¹ Ted Chiang (2020): *Exhalation: Short Stories*: Picador. 以下小说文本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在厄尔森夫人的案例中，技术异化被莫罗推向了极致。厄尔森夫人来“我聊”公司寻求临终关怀，作为寡妇的她与唯一的儿子关系恶化，临终之时竟无一人可以倾诉内心，只有在平行自我面前才能得到片刻安慰。莫罗却罔顾道德窃听厄尔森夫人与平行自我的谈话，只为能得到敲诈其财产的灵感，最终欺骗厄尔森夫人将遗产转账给伪造的平行账户。莫罗将临终关怀异化为经济欺诈，彻底消解了技术的伦理性：当棱镜承载的关怀性自我对话被降格为商业情报源，科技便从连接人类精神世界的桥梁异化为吞噬主体性的黑洞。莫罗对厄尔森夫人遗产的欺诈，其本质不在于财富掠夺，而在于对人性信念的系统性瓦解——他利用技术营造的虚幻救赎，摧毁了道德关怀。此时的技术不再是连接人性的渠道，而是成为资本掠夺的管道。莫罗的冷血算计与厄尔森夫人临终的心理依赖形成残酷对照，暴露出技术资本化过程中伦理温度的彻底流失。资本理性对主体道德判断的剥夺，最终导致技术宿命论对自由意志的吞噬——莫罗的生命终结恰成为这一命题的残酷注脚。

莫罗生命终结的戏剧性场景，揭示了技术宿命论与自由意志的深层冲突。成功收购棱镜后，厄尔森夫人的儿子却突然闯进店铺，用枪威胁莫罗偿还骗取他母亲的遗产。莫罗被枪所指，却能云淡风轻的矢口否认，拒绝交出，最终逼得厄尔森之子无奈离开。事后奈特问他如何能如此淡定，莫罗断言“他没那个胆子”，（p.261）然而就在此时厄尔森之子去而复返，说出“既然总有一条时间线上的我会开枪，那为何不能是此刻的我”（p.266）后将莫罗射杀。莫罗看似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但当莫罗断言厄尔森夫人之子不敢开枪时，表面上是对平行自我所传递之信息的信任，本质上却暴露了技术决定论的认知桎梏。这种将概率论等同于命运铁律的思维，使得莫罗丧失了作为伦理主体的判断能力。而厄尔森的宣言虽然成为了他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但也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反叛宣言，更标志着伦理主体性的复苏——在无数个平行时空的叠加态中，当下的自由选择才具有本体论价值。

通过对莫罗的深层解析，可见聂珍钊（2014, p.33）所指“科学选择需处理科技与人关系”命题的迫切性。莫罗的死亡表明：当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加速器而非人性完善的助推器时，科学选择将异化为反伦理的进程。同时也展示了技术对人的隐蔽毒害：个体在技术系统内被异化为经济单元的危险，以及道德价值在社会技术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趋势。若一味地崇尚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将会导致科技与伦理的失衡。（孙宇、王佳鑫，2024, p.128）在“后伦理选择时代”，莫罗式的单向度思维必须被警惕——科技发展不应成为逃避伦理责任的通道，而应成为构筑新型主体性的界面。莫罗的死亡既是个体伦理主体性瓦解的终局，也为重构科技时代的道德坐标提供了镜鉴：唯有在技术实践中持续注入伦理自觉，才能真正维护人性的完整性。

二、存在拓扑：赎罪者的科技救赎

单向度伦理者的覆灭揭示了技术异化的极端后果，而戴娜的救赎实践则展现了另一条可能的道路——在科技解构伦理判断的语境下，主体如何通过持续性伦理行动重构道德责任。作为心理治疗师对直面自我的抗拒，与经济资助行为的无限延伸，共同暴露出后伦理选择主体面临的核心困境：当科技解构传统的道德判断方式，伦理责任应当如何重新锚定？这一过程既指向主体在后伦理世界中做出的具体选择，也涉及科技工具对道德认知的重塑。

戴娜对使用棱镜的抗拒，本质上还是认同确定性道德的消解。戴娜是一位心理咨询师，高中时期与好友温妮莎一同吸毒，事情败露之时将责任全都推给温妮莎，因此一直觉得好友的堕落是自己的错，于是多年来资助温妮莎，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这样的行为赎罪。然而这位引导他人直面心理困

境的心理咨询师，却一直回避平行自我，拒绝使用棱镜。她对当年可能性选择的回避实际上凸显了主体性建构的深层矛盾——如果查询棱镜的结果证明当年的自己本可以避免错误，那么此时空自己的罪恶则会增加，同时自身赎罪行为的正当性也会遭遇根本性质疑，自己将永远无法摆脱罪恶感。她不敢直面可能性，说明仍然不敢真正直面自己当年的错误，不认为自己本时空的补偿行为能够弥补其他可能的分支所强化的罪恶。这种愧疚偶尔能见于她为他人做心理疏导之时，共感于同样对犯错而愧疚之人，从而失去一贯的冷静。戴娜的心理困境也揭示出后伦理选择时代的认知转向：在科技重构现实感知的语境下，道德责任不再建基于单一现实中确定性的因果律，而需考虑多个可能性的分支时空的动态叠加，善与恶的问题也因此会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存在认知局限，戴娜的赎罪行为依然展现出突破技术决定论的潜在可能，戴娜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赎罪的伦理路径。多年以来，她持续为温妮莎提供经济资助，资助她上学、开网店、投资，即使屡次失败，温妮莎的父母也已放弃她，心里明知温妮莎在利用自己的罪恶感，戴娜也毫无怨言。虽然这种单维度的救赎又可能异化为齐泽克（Žižek, 2006, p.129）所说的“拜物教置换”——在明知金钱只是幻象之时仍将对复杂社会关系的处理简化为经济补偿。这种救赎模式有其局限性：当道德实践被简化为可量化的经济行为时，真正的伦理责任可能被符号价值所遮蔽。但戴娜显然并未完全沉溺于这种符号化救赎，除了远超补偿数额的经济支持以外，她选择成为心理治疗师，“尝试改善温妮莎的人生”，（p.277）在工作之余还主持互助小组，用其专业表现帮助每一个迷茫无助的人走出心理困境，拯救一个又一个堕落的“温妮莎”，暗示着主体仍在寻找超越经济赎罪的更丰富伦理路径。这种由经济赎罪向伦理实践转化的关键转折，在奈特介入的叙事节点中更加突出。

奈特的介入及棱镜揭示的真相，让戴娜获得了最终救赎。奈特本是为了诱骗莱尔出售棱镜而加入了互助小组，最终却接受了小组主持人戴娜的道德教诲，用倒卖棱镜的钱款查询戴娜当年做出不同选择的各个分支，棱镜显示，不论戴娜作何选择，温妮莎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向堕落，而戴娜都会为此感到自责。戴娜避之不及的棱镜却肯定了她的赎罪行为，让她获得了心灵救赎，这一戏剧化的情节其实正体现了“真-善”（苏晖，2022, p.48）引导后伦理选择的必要性。棱镜作为绝对中立的数据，只会成为人性的放大器——坚持向善的戴娜在所有分支中都会无怨无悔的选择赎罪，而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温妮莎在所有分支中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走向堕落，人的善恶不会因为棱镜而改变，只会被棱镜放大。使得戴娜获得救赎的是她坚持不懈的赎罪实践，这些实践产生了善的涟漪，使奈特获得了道德教化，最终回馈到戴娜自身，使她获得了救赎。戴娜虽未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却在其坚持向善的过程中重塑了主体的伦理本质。棱镜使得戴娜最终意识到，真正的救赎不是寻找“理想自我”的证明，而是在技术重构的世界中，持续以伦理主体姿态进行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我赋形。

当戴娜被迫直面平行自我的数据时，技术从诱发焦虑的工具转换为照见存在本质的明镜。这种技术认知的转换路径，指向后伦理选择时代的关键命题——人类必须发展出与技术的新型关系，使其成为伦理自觉的激发装置而非遮蔽工具。戴娜的救赎之路证明，在后伦理选择时代，真正的道德觉醒不在于如戴娜一般逃避技术，而是在于坚持伦理实践，做出“自我的主动选择（汪民安，2018, p.294）”来构造主体性——当总体性救赎成为不可能，每个当下时刻的伦理选择便成为照亮存在迷宫的星火。

三、主体重生：觉醒者的伦理重构

戴娜通过技术工具实现的自我救赎揭示出伦理自觉的可能性，而奈特的转变则展现了更具普适性的主体重构路径——当个体既不完全逃避也不极端依附技术时，如何在技术决定论的裂缝中重构道德主体。奈特的道德觉醒并非依托宏大叙事，而是始于其日常行为中的矛盾性实践：她一边利用棱镜投机牟利，深陷技术异化的逻辑，一边以细微的善行无意识地抵抗着道德惯性的钳制。“矛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新旧交替的巨变”，（管季，2023, p.64）这种矛盾透露出一个核心命题——人类在技术决定论的框架下，依然能通过递归式伦理选择重构主体性。奈特的转变表明，个体不应被动受困于棱镜揭示的可能分支，而应该在对宿命论的批判性反思中，将技术工具转化为道德自省的放大镜，最终以行动重构主体道德。

奈特的主体觉醒的契机潜藏在她日常行为的微小善意间。奈特过去的人生算不上有道德，她过去与温妮莎一样，“总是把自己的问题归罪于别人”（p.252）——她把强闯民宅被捕归于父母的过错，认为如果不是他们换了家里的门锁，自己也不用入室盗窃换毒资。她所擅长的技能是诈骗，认为行骗能够安全替代吸毒的快感，为了倒卖特殊棱镜而利用莱尔的信任，加入互助小组诱骗他出售棱镜。甚至在退还多找的零钱这种举手之劳中，她也会觉得是“锦上添花”（p.268）而不会将多余的钱退还。然而，奈特看似虚无的生活中仍残存着向善的星火：虽然本质仍是欺骗，但奈特极力反对莫罗提出的暴力践踏莱尔名誉逼他卖出棱镜的计划，采取相对温和人道的方式，一步步取得莱尔的信任来收购棱镜；即使改变不了利用他人苦难投机赚钱的本质，奈特还是与莫罗不同，愿意在未结清钱款之时就将棱镜留给丧偶夫妇，不忍心打断这对苦命夫妻来之不易的相聚；戒毒多年以来也一直在主动遏制毒瘾复发，换新的城市与新的工作，努力享受“辛勤劳动赚钱”（p.242）的生活，在意识到继续行骗会让自己重新涉毒时，她决心从中抽身。这种道德微光的闪烁构成了伦理觉醒的原始动力，才能让奈特在目睹莫罗的悲剧之后幡然醒悟。

莫罗的悲剧引发了奈特的主体性思考，认清了科技的中立本质。“恶的出现是对进行伦理选择的主体的考验，它激发着主体的道德意识，能将善更好地体现出来”。（聂珍钊等，2022, p.104）莫罗之死与厄尔森夫人的儿子开枪前那句“总有一条时间线上的我会开枪，那为什么不是现在的我？”（p.266）引发了奈特的思考。奈特意识到这句言论是错误的，因为棱镜只是一个观测工具，而不是产生分支的工具。在棱镜被发明前就有无数的分支，只是我们无法联系。如果罪犯说总有一个分支的自己会开枪，而自己正是那个分支，那他就只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因为分支的情况是不变的，唯一的变化仅仅是我们能够观测到各个分支。因此，正如《技术与文明》中所说：“如果我们自己的灵魂是空虚的，机器系统只会让我们更加空虚。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被动而无力，机器系统将使我们变得更加脆弱”（Mumford, 2002, p.2）。棱镜不过是一个放大镜，恶者以决定论为遮羞布加速沉沦，本就心存恶念之人用棱镜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强化“反常之魔”（p.254）的诱惑，正如激情杀人的厄尔森之子；而善者以递归善行塑造道德主体，对于持续向善的人，棱镜会激发善的涟漪，将善行递归到每一个平行分支，如戴娜一般获得救赎。

在戴娜的引导下，奈特完成了伦理认知的突破。奈特意识到，不管自己是做出正确还是错误伦理选择的分支，只要在当下努力做好事，那么未来每一个分支的自己都会做出正确伦理选择，她会在一次次的善行中塑造一个平行世界中更好的自己。奈特选择把利用他人不幸倒卖棱镜赚的一大笔钱用于帮助戴娜，迈出了重构道德主体的第一步，这种方式并未诉诸道德说教或情感绑架，而是运

用技术自身的逻辑破解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局——用棱镜查询的结果解构道德桎梏，将自由意志重新锚定于持续性的伦理实践。而这一过程也帮助奈特完成了主体存在的象征性重构：金钱从诈骗工具逆转为伦理觉醒的介质，技术工具重新被纳入伦理轨道。奈特的主体性觉醒既非道德完人的矫饰，亦非技术祛魅的幻灭，而是承认人性缺陷的前提下，在技术界面实现的主体性重构。

四、结语

《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以莫罗、戴娜、奈特三位主体的命运变奏曲，在技术光锥的投影下谱写出后伦理选择时代的启示录。詹姆逊将科幻小说定义为“未来考古学”，认为它“没有真正的试图设想我们自己的社会体系的真实的未来”，相反，它的“多种模拟的未来”“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未来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Jameson, 2005, p.288）特德·姜笔下的平行世界正是这样一种“模拟的未来”——它们并非逃离现实的幻想，而是将当下伦理选择的重量，转化为未来可能性的决定性基石。莫罗、戴娜、奈特的命运并非孤立个体的挣扎，而是三棱镜折射出的当代伦理光谱：莫罗之死警示着技术异化的深渊，戴娜的救赎揭示了科技时代道德焦虑的破解路径，而奈特的重生则展现伦理主体在技术界面实现超越的可能性。当棱镜将平行宇宙的镜像投射于现世，人类面临的本质考验从未改变——如何在不完美的选择中坚持向善的信念。这其中包含的预见性无疑“对现实世界的灾难或不幸事件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Z. Kendal et al., 2020, p.29）小说通过戴娜与温妮莎的救赎辩证法，质问每个技术时代的伦理主体：当“真”意味着接受技术祛魅后的生存本相，“善”将何以可能？答案潜藏在奈特的蜕变轨迹中——这位曾经的道德败坏者，最终将资本与技术合谋的诈骗后倒卖而得的赃款，逆向改造成伦理觉醒的培养基。这无疑体现了“真-善”伦理价值取向的重要性：真，是直面技术祛魅后的存在本相；善，是在科学选择的混沌中锚定道德罗盘。小说最终暗示，人类无需执着于寻找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应致力于在每个节点缔造向善的分支，以善的涟漪激活道德棱镜。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u X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6651-8373>

Qu Tao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8226-1025>

References

管季（2023）：“‘后人类’与文学伦理的转向——基于当代文学现状的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05）：54-66。

[Guan Ji (2023). “‘Posthuman’ and the Ethical Turn in Literature: 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Landscap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05): 54-66.]

聂珍钊（2014）：《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Nie Zhenzhao (2014).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聂珍钊、傅修延、刘建军、吴笛、杨金才、张同胜&苏晖（2022）：“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跨学科前沿（笔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2）：79-105。

[Nie Zhenzhao, et al. (20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Frontiers of Literature (Symposium).”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2): 79-105. DOI: <https://doi.org/10.19992/j.cnki.1000-2456.2022.02.009>]

庞好农（2022）：“从隐身术到造人——科幻小说对科学伦理的警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65-72。

[Pang Haonong (2022). “From Invisibility to Anthropogenesis: Science Fiction’s Warnings on Scientific Ethics.”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5): 65-72. DOI: <https://doi.org/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22.05.007>]

斯拉沃热·齐泽克（2006）：《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Žižek, Slavoj (2006).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translated by Hu Yutan, Ye Xia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苏晖（2022）：“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外国文学研究》（06）：37-51。

[Su Hui (2022). “Scientific Choice in the Post-Ethical Choice Er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6): 37-51.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is.2022.0079>]

孙宇、王佳鑫（2024）：“中美科幻小说中新兴生物技术的生命伦理反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4）：120-129。

[Sun Yu, Wang Jiabin (2024). “Bioethical Reflections on Emerging Biotechnologi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4): 120-129.]

吴岩（2008）：《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出版社。

[Wu Yan (2008). *Science Fiction Literary Theory and Disciplinary System Construction*.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

吴能表（2018）：《生命科学与伦理》。科学出版社。

[Wu Nengbiao (2018). *Life Science and Ethics*.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Ltd.]

汪民安（2018）：《福柯的界线》。河南大学出版社。

[Wang Minan (2018). *The Limits of Michel Foucault*. Henan University Press.]

王双（2025）：“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人文关怀”，《当代文坛》（02）：196-201。

[Wang Shuang (2025). “Humanistic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02): 196-201.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820.2025.02.028>]

徐刚、胡铁生（2023）：“未来主义：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新趋势”，《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90-95。

[Xu Gang, Hu Tiesheng (2023). “Futurism: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2): 90-95.]

徐晓雪（2025）：“异星文本的转码器：中国当代科幻海外传播的叙事密码与文化拓扑——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文艺国际传播研究》（01）：157-160。

[Xu Xiaoxue (2025). “Trans-coders of Alien Texts: Narrative Codes and Cultural Topographi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Overseas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01): 157-160.]

Caroti, Simone (2011). *The Generation Starship in Science Fiction: A Critical History, 1934-2001*. McFarland.

Chiang, Ted (2020). *Exhalation: Short Stories*. Picador.

Jameson, Fredric (2005).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Verso.

Kendal, Zachary. et al. (2020). *Ethical Futures and Global Science Fi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Mumford, Lewis (2002).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Routledge & Kegan Paul.

Suvin, Darko (1979).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Elizabeth & Edmond, Wright (1999). *The Zizek Reader*. Blackwell.